



名人

的
妻子
忆
丈夫

丈夫

The celebrity's wife recalls her husband

凡夫 阿亭一 选编

A 卷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的妻子忆丈夫·A卷/凡夫 阿亭选编.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2.9

ISBN 7 - 80607 - 946 - 7

I . 名… II . 杨… III . 回忆录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550 号

本书作者中,尚有部分我们未能及时与
之取得联系,盼见书后速将邮编、地址告诉
我们,以便尽早奉上样书与薄酬。

名人的妻子忆丈夫·A卷

凡夫 阿亭选编

责任编辑:李一安

封面设计:鲍 钧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 297 号二层

电 话:0756 - 2222759 邮编:519001

E - mail: zhchsl@pub. zhuhai. gd. cn

印 刷:广东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mm 1/32

印 张:15.125 字数:393 千字

版 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6000 册

ISBN 7 - 80607 - 946 - 7/1·369

定 价: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有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1
- 叶 华：我和萧三/10
- 韩菁清：和梁实秋结婚那一天/21
- 陈竹隐：追忆朱自清/26
- 杨步伟：赵元任和杨步伟/43
- 舒令漪：追忆裴文中/89
- 潘 素：忆伯驹/101
- 王映霞：郁达夫与我婚变经过/106
- 张幼仪：我和徐志摩分手的经过/123
- 沈粹缜：邹韬奋的早年生活/131
- 高 真：一多牺牲前后纪实/145
- 林 洙：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忆建筑师梁思成/166
- 胡美琦：我所了解的学人生活/190
- 冰 心：我的老伴——吴文藻/199
- 沈 谱：范长江和我的婚后生活片断/218
- 刘 莹：我与王实味/226

- 胡絮青：谈老舍/250
- 王德芬：安息吧，萧军老伴/266
- 吴似鸿：蒋光慈回忆录/291
- 梅志：我第一次生孩子时的几件事/323
- 杨绛：写《围城》的钱钟书/330
- 文洁若：迟来的蜜月
——我与萧乾/343
- 赵萝蕤：忆梦家/356
- 姚可昆：从相识到结婚/362
- 丁一岚：诗思·诗情·诗魂
——我喜爱邓拓的诗/383
- 黄宗英：快乐的阿丹/391
- 丁雪松：我和郑律成/404
- 秦怡：金焰与我二三事/428
- 傅雅雯：泪凝的记忆
——悼丈夫志民一生之坎坷/446
- 问彬：杜鹏程的生活与创作/454

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 许广平

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然而每回谈到关于他的一切，却使我伤恻，时常眼睛被水蒸气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我愿意追述他，又怕追述他，更怕追述得歪曲了，丧失了我对于他的敬意。我诚然做过他的门徒，但离了学生生活之后，还是一样敬重的我的导师，我将能怎样描写我心中所愿意说的话？

“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这是古人的一句成语，拿来转赠给鲁迅先生，是很恰当的。我推测他的所以“囚首垢面”，不是故意惊世骇俗，老实说，还是浮奢之风，不期引起他的不重皮相，不以外貌评衡一般事态，对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

做学生的时候，我曾正如一般顽童，边听讲边把这位满身补钉，不，满天星斗，一团漆黑，长发直竖的先生速写起来。我更很快就研究他的为什么。后来比较熟识了，我问他是不是特意做成这样的“保护色”，使人不注意？他好像默然地笑了，这时我以为探寻到什么似的喜悦，给我猜中了罢。

其实，沉迷于自己的理想生活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注意是很相反的。有谁见过那些发明家在沉浸于学问的研求时，还时刻想到他的生活。拿表当做鸡蛋煮，和为了医学上的研究，甚至把有

害生命的细菌也吞到自己肚子里做实际试验的精神贯注，不顾一切的人，不是也听到过的吗？所以鲁迅的一种寒伧之状，正不足为奇的。

另外的原因，他对于衣服极不讲究，也许是一种反感使然。据他自己说，小的时候，家人叫他穿新衣，又怕新衣弄污，势必时常监视警告，于是坐立都不自由了，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因此他宁可穿得坏些，布制的更好。方便的时候，譬如吃完点心糖果之类，他手边如果没有揩布，也可以很随便地往身上一揩。初到上海的时候，穿久了的蓝布夹袄破了，我买到蓝色的毛葛换做一件。做好之后，他无论如何不肯穿上身，说是滑溜溜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这件衣服转赠别人，从此不敢做这一类质地的衣料。直到他最后的一年，身体瘦弱得很，经不起重压，特做一件丝绵的棕色湖绉长袍，但是穿不到几次，就变成临终穿在身上的尸衣，这恐怕是成人以后最讲究的一件了。

他对于幼年穿新衣的不自由给予深刻的印象，所以对于海婴的衣着，穿了之后，是不愿意叫他当心的。如果他的手也揩在身上，那算是和父亲学样，满不在乎的，就是我在旁边看到的不舒服，也不好干涉，这时完全孤立了。

孔子的“栖栖遑遑”，是为的周游列国，想做官，来达到他改革社会的理想。而鲁迅也终日“栖栖遑遑”地“席不暇暖”，却为的是人手少，要急着做的事情正多，他以一当百还嫌不够，时常说：“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有一百个，中国不是这样了。”所以一面自己加紧工作，一面寻求精神的战士。

有些青年是那么热切地登门求教。在北京，我所见到的他的寓所，是时常川流不息地一批去了又来一批，甚至错过了吃饭的时间来陪客的。自然这其中也许有些不过是来听听他的幽默谈话，博得轻松的一笑而去。这当然对于他是一种损害，但更不乏至诚至正地来求教。他绝不忍为了宝爱自己的光阴而拒却过。有时谈兴正浓，他反而会留你多坐一会。诚挚而又沉潜，久之意气

相投，和他共鸣的精神战士，以他做轴心，而放散到四面八方的不知凡几。

因为工作繁忙和来客的不限制，鲁迅生活是起居无时的。大概在北京时平均每天到夜里 10~12 时始客散。之后，如果没有什么急待准备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书，2 时左右就入睡了。他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体，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两三个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就这样，像兵士伏在战壕休息一下一样，又像北京话的“打一个盹”，翻个身醒了，抽一支烟，起来泡杯浓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野草》，大部分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

有时写兴正浓，放不下笔，直至东方发白，是常有的事。在《彷徨》中的《伤逝》，他是一口气写成功的。劝他休息，他就说：“写小说是不能够休息的，过了一夜，那个创造的人脾气也许会两样，写出来就不像预料的一样，甚至会相反的了。”又说：“写文章的人生活是无法调整的，我真佩服外国作家的定出时间来，到时候了，立刻停笔做别的事，我却没有这本领。”

但是他的脾气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上海，头发也不那么长了，衣服也不一定补钉了，差不多的时候也肯抽出时间做清洁运动了。他并不过分孤行己意，有时也体谅到和他一同生活的别人。尤其留心的是不要因为他而使别人多受苦。所以，他很能觉察到我的疲倦，会催促快去休息，更抱歉他的不断工作的匆忙没有多聚谈的机会，每每赎罪似地在我睡前陪几分钟。临到要睡下了，他总是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好的。”那么他会躺在旁边，很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或友朋往来，或小孩子与家务，或文坛情形，谈得起劲，他就要求说：“我再抽一支烟好吗？”同意了会谈得更高兴，但不争气的多是我，没有振作精神领受他的谈话，有时当作是催眠歌般不到一支烟完了，立刻睡熟了。他这时会轻轻地走开，自己去做他急待动笔的译作。

偶然也会例外，那是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

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的，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会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那时候我真痛苦万状。为了我的过失吗？打我骂我都可以，为什么弄到无言！如果真是轻蔑之极了，那我们可以走开，不是谁都没有勉强过谁吗？我不是伤痛我自己的遭遇，而是焦急他的自弃。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时，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漠斯一样（用何凝先生的譬语），跑到空地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了的羊，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这些情形，我见过不止一次，我能这时候把他丢下不理吗？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睡下，我不禁转悲为笑，而他这时倒爬起身来了。他决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他时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我明白他的天真。他对一切人可以不在意，但对爱人或者会更苛求。后来看到海婴的对我时常多方刁难，更懂得了为什么对最关切的人如此相待。受到社会上许多磨难的他，一有感触，会千百倍于常人的看法的，我同情他，不知道如何自处，向他发怒吗？那不是我所能够。向他讨饶吗？有时实在莫名其妙，而且自尊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不知道要饶什么。抑郁，怅惘，彷徨，真想痛哭一场，然而这是弱者的行径，不愿意。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

他处理他的书籍文具，似乎是比生命还看重，看看他的衣身，是不会想到这样一个相反的对照的。比如书齧破了，急起来他会把衣袖去揩拭，手不干净，也一定洗好才翻看。书架的书，是非常之整齐，一切的文具用品，是他经手的，都有一定的位

置，不许放乱。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他处理用品，就像药房的井然有序，无论怎样忙，写完字之后，一定把桌面收理好，然后才做别的事。他的抽屉，也一样的有秩序，是不愿意人搬弄的。在北京时，他小小的寝室，经常也是会客室，怕人家随手翻乱他的书，所以爱好欣赏些的，总是藏在较不注意的地方。他更不愿意借书给人，除非万不得已，遇到来借，倒不如另买一本赠送较妥。有时送给他的丛书，为了急于把同类的包藏起来，就是我预备看时也会嫌等得太久而包起的。曹禺先生的《日出》，我就没有看完，给划然中止，好像电影正开到一半停止住了的不舒服。但是如果海婴来抢他看开的书，或翻弄他的图画书，他却从未阻止过，至多叫我在旁边帮忙照料，让他看完才收好。他对于幼小者的同情，不肯拂逆他的意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一样，甚至对于他酷爱的书也如此。

他对于书的看重，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像他这样。比如人家送他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的定期刊物，他看完了之后，总是每五六册做一包，扎好，写上书名和第几期至第几期，以便检查。凡是包过的书，那方正紧凑，拆开之后，我是再也不能照样包好的。他不但包得好，对于扎的绳子也很留意，如果是好些的书，或线装本，扎时一定要拣那些有浆质棉线做的绳子，免得扎的地方日久留一条线痕。就是这扁平的棉绳，扎时也要摊平，线头的结，一定要打在书的边缘，省得将来压着一个结的痕迹。有时人们送给他的定期刊物如《文学》之类，偶然收到一本装订不大齐正的，他一定另外托人再买一本较好的换过。自己印好的书，也首先拣出两部，包好起来。这爱惜的书，我很对不起，自他死后，未能好好地整理妥存起来，不免有些污损的了。

对于线装书，他也能够拆散修理，装订完好。像《北平笈谱》的线装之外，更布包角头，遇有缺页时，都是他自己拆添完善，和原来一样齐正。而且订的双线也一定使它平行，绝不肯让

其绞缠一起。有时对于太旧的古书，两头都被尘埃染黑了，他也会一手紧压，一手用浮水石把它磨干净，使之焕然一新。

洋装书如果是时常用到的，他就先包一张书皮，省得龌龊。送给我的好些新书，他更喜欢把蜡光纸给包一张封面。在北京，有时到他那里，他会把四五本自己写作和别人的著作，每本都用雪白的纸包好见赠，接到手真不知如何从心底感谢呢。

他不但书包装得好，信封也做得好，大约一些老朋友还记得收到过他亲手做的信封的。在北京时，常常看见他把寄来的比较大而质厚的信封翻转面，更有时是把一张长方纸做成一只信封，非常之齐整匀称，绝不歪斜，大小异形，用一定的方法、技巧，纯熟而又敏捷，一下子做出一批来了。既能把包裹纸改成信封，真所谓化无用为有用，更于他那时的经济条件适合。但我还不了解他的苦心，反而向他恶作剧似地讽刺，把见到的纸张都叠起来请他做信封。然而他何必多作辩解呢，只笑一笑，就是了。想起来都难过，我太肤浅，类似这样的捣乱真可恶。

说到废纸做信封，我更忆起他日常生活之一的惜物。每于包裹的东西拆开之后，不但纸张摊平，放好，留待应用，而且更把绳子卷好，集在一起，预备要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其长短粗细，适当地用。自然这些无关大体的琐屑细微之极的枝叶问题，或者是毫不足道的。在一些大人先生们或洋博士之流，何尝会把这戈戈放在眼里，而他则正惟其如此，日积月累地，随时随地可省则省，留有用的金钱，做些于人于社会有益的事。不然，不管他如何大心助人，以区区收入，再不处之俭省，怎能做到他当时所愿做的呢。

有些地方他却不愿意节省，例如住房子。我们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平常租一层楼就够用了，而他却要独幢的三层楼，宁可让它空出些地方来，比较舒服，虽然女工倒是不用。吃的东西虽随便，但隔夜的菜是不大欢喜吃的，只有火腿他还爱吃，预备出来不一定一餐用完，那么连用几次也可以。素的菜蔬他是不大

吃的，鱼也懒得吃，因为细骨头多，时间不经济，也觉得把时间用在这种地方是可惜的。照例日常以鱼肉菜蔬做主体，但这里已经有一大部分不爱用了。爱用的还有辣椒，说起来也有一段可悲的生活在里面。据他时常说起的是：当他领受他母亲的八块钱到南京求学，到了之后，款就用完了。入学之后，再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给他做御寒的棉衣，而冬天来了，砭人肌骨的寒威是那么严酷，没有法子，就开始吃辣椒取热，以至成了习惯，进而变为嗜好，因之更是损害到胃的健康的要素之一。糖也欢喜吃，但是总爱买三四角钱一磅的廉价品，在北京时，东城有一家法国点心铺，算是那时首屈一指的了，很难得的机会，他才从收到的有限的稿费里买两块钱蛋糕来吃，而且也欢喜请我们。有时我会问他为什么刚才不拿出来请客，他却叹息地说：“你不晓得的，有些少爷真难弄，吃了有时反而会说我阔气，经常吃这样点心，不会相信我是偶然的。”这可见他的随处小心，一面我也疑心到他的过虑。但事实是：有时他知道某一位的艰困，请他们吃便饭，结果会说是他用酒食贿赂的呢，有的人就能够这样出奇，也难怪他的过虑。即使如此过虑，也还不免于谤毁的到来，所以有时他的举动，如果不是在社会上身受到多方的经验，是不大容易了解的，至少我自己觉得越过一天越加深地了解他。

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为是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其实他并不至于像刘伶一样，如果有职务要做，他第一个是守时刻，绝不多饮的。他的尊人很爱吃酒，吃后时常会发酒脾气，这个印象给他很深刻，所以饮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自己就紧缩起来，无论如何劝进是无效的。但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也会放任多饮些，例如在厦门大学，看到办教育的当局对资本家捧场，甚至认出钱办学校的人好像是父亲，教职员就像儿子的怪论，真使他气愤难平，当场给予打击。同时也豪饮起来，大约有些醉了，回到寝室，靠在躺椅上，抽着烟睡熟了，醒转来觉得热烘烘的，一看眼前一团火，身上腹部的棉袍被香烟头

引着了，救熄之后，烧了七八寸直径的一大块。后来我晓得了，就作为一个根据，不放心他一个人独自跑到别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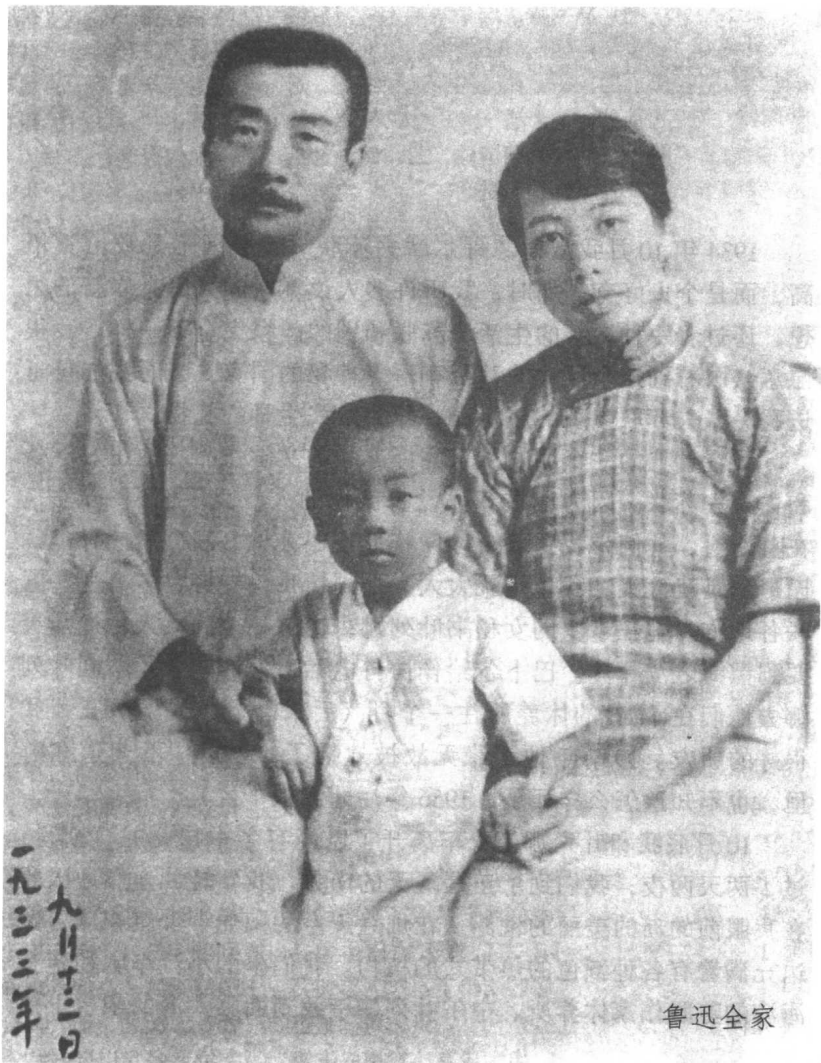
茶饮得很多的，而且一定要清茶。在北京时，他独用一只只有盖的旧式茶杯，每饮一次泡一次，很浓，是我们用起来觉得有苦味的，还可以再泡一次。到了上海，改用小壶泡茶，但是稍久之后，茶的香气会失去的。如果不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细细品茶，他就会要求另换一壶。等到新鲜的茶来了，恰到好处的时候，他一面称赏，一面就劝我也饮一杯，因此我也学会吃浓茶了。

他更爱吸烟，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工作越忙，越是手不停烟，这时候一半吸掉，一半是烧掉的。在北京和章士钊之流的正人君子斗争，医生曾经通知过他，服药同时吸烟病不会好的，我们几个学生那时就经常做监视的工作，结果仍然未能停止，从此之后，只不过劝告减少而已。他用的烟是廉价品，遇到朋友送些好的，也不肯独用，一定分赠些给别人，共同欣赏。黑猫牌的香烟他最爱好，可惜价钱贵，难得买来吸。还有一种似香烟粗细，用烟叶做成的廉价品，吸起来似雪茄烟气味，他也爱好，但气味不好，我又不喜欢，他也就不买了。偶然也吸雪茄烟，似乎并不很爱。烟灰缸却一定要深而且大，放些水，省得灰随风乱飞。烟嘴是在上海以后才经常用的，又俭省，吸到半寸长，手都拿不住才弃掉，如果那些拾香烟头的遇到他，一定没有好处，因为那一部分已经给烟油弄潮湿，不好再用了。

记不清有谁说过：鲁迅的生活，是精神胜于物质。的确的，他日常起来迟了，多在 11 时许，那么午饭就吃不下了，这样一起床就开始工作，有时直至吃夜饭才用膳，也不过两三种饭菜，半杯薄酒而已。想起来却是我的罪过，不会好好地注意他的营养，到后来，好像灯油耗尽，那火光还能支持吗？

我很直白地把他的生活写出来，但并不希望我们的文坛志士因热爱他而全盘模仿。譬如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有朋友看到我对

于他的一切，恰好他的爱人也是学生，于是很神气地说：“我是你的先生，我应该教你，你应当像某某一样。”又有一位听到我说过鲁迅不肯借书给人，于是他对他的爱人也如此。这未免太“那个”了。我想该大可不必的。写这篇短文的本意毫不在此。



我和萧三

□ 叶 华

1934年10月我从斯德哥尔摩去苏联。其原因不是政治觉悟高，而是个人好奇。那时，我听许多人说苏联的人民有崭新的思想，还过着一种崭新的生活，苏联和别的国家完全不一样。我很愿意亲眼看到这个巨大的甚至有一点神秘的国家。当时我的哥哥送我一张去苏联参观的旅行证，作为给我生日的礼物。

我在瑞典的一个朋友从事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他正好准备和夫人去苏联。因为我在苏联没有认识的人，就跟他们一起去。在莫斯科，他们带我到著名苏联作家巴卜尔（Babel）的家作客。巴卜尔是犹太人，我也是犹太人。他同情我，支持我多参观些苏联各地方。他三十岁的女秘书叶列娜，也是一个犹太人，过几天要到黑海之滨休养。巴卜尔给作协打电话，他们同意我陪同叶列娜去他们在 Gagni 的休养所住一个月（后来巴卜尔成了萧三和我很好的朋友。1937年他无缘无故被逮捕了，以后，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样死了，1956年后才给他平反）。

10月底我和叶列娜坐火车离开了已经有冬季味儿的莫斯科。过了两天两夜，我们到了正是夏天的南方。我年轻，全心地吸收在我眼前的新的美丽的世界。在灿烂天空的阳光下红旗飘飘，路边充满着有各种颜色的热带式的植物。我们坐的小汽车驰往建在海滨的苏联作家休养所。中午叶列娜带我到面临大海的阳台上摆

的餐桌旁。在这里我就认识了中国的诗人萧三。那时我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长大的二十三岁的德国资产阶级小姐。他是一位三十八岁的中国革命家和共产党员。我们这么两个人，是属于“两极”，但却一见钟情，互相非常喜欢。我们的爱情经过了不断的考验，不论是政治方面的暴风骤雨，还是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以及其间几次好几年的分开——我们的爱情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一生一世，直到1983年2月4日，萧三逝世那一天。

萧三跟我在瑞典接触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或是共产主义者不一样。那些人只是在口头上讲讲革命的道理，而萧三却是实际的革命家。那时他参加革命活动将近二十年。当时我只懂得很少的俄文。在这样的情况下，萧三用我能明白和理解的简单的方法给我讲述了他怎样成为一个革命者。他出生在湖南，十三岁时在东山学堂上学，和十六岁的毛泽东是同学。毛泽东对萧三特别好，他们成了朋友，偷偷地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毛泽东说，中国也需要传记里写的这样的人物。后来萧三到第一师范求学，毛泽东比他后进校，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将一部分同学组织起来，把课余的活动搞得十分活跃。毛泽东把自己丰富的知识告诉同学们，给他们讲述辛亥革命，讲述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后来他还分析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势。那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救国的思想。在毛泽东强烈的革命精神影响下，萧三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18年4月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创建了新民学会。1919年他在北平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他在法国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在那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以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1月21日当列宁逝世时，萧三正在莫斯科学习，他流着眼泪告诉我，在他向列宁的遗体告别时，他发誓永远忠于革命事业。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他的一生没有违背他当时的誓言。

萧三还给我讲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他正在苏联养病，因此他不能回国，他还说他当时的任务就是通过作报告、写文章、写诗来宣传中国的革命。后来在我们共同的生活里，我才

进一步地了解到当时他工作的意义。那时候他送给我一本小册子，是他在苏联出版的诗集。这些诗我还看不懂，但我明白这本诗集作者的身分：一个是“埃弥萧——中国革命的歌手”，另一个是“埃弥萧——苏维埃中国的诗人”。这是我二十三岁的生命中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的事迹。当时我心里感到热呼呼的。我很愿意和他一起干革命。但是从愿望到实现这个愿望，是要克服自己思想上许多矛盾和战胜许多具体的困难的。我当时是德国公民。1934年至1935年的德国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不允许一个普通的德国公民长期地在他们国家居住的。所以1935年2月5日我离开莫斯科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可以说是被迫离开的。

二

我离开莫斯科后，萧三几乎天天给我来信，或打电话。在每一封信里，除了俄文外，有时他还加上几句用拉丁字拼的中文。1935年2月6日他给我的信中说：“……你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孩子，我非常地爱你。”“我的爱人耶娃，我很高兴地收到了你的信。我谢谢你，我的耶娃……我要你快点来莫斯科，很快地来！”（2月13日）“……不要忘了我，我非常地爱你。”（2月15日）萧三给我的信，我迄今仍然保存下来。我给他的信都丢失了。所以我现在只能通过他的来信回忆当时的情景。

很快地萧三告诉我，如果我要去苏联和他结婚，我就必须加入苏联国籍。2月22日他在给我的用俄文写的信中说：“我很高兴你一下子决定加入苏联国籍。你真聪明！”是的，开始我是同意了，但以后我又犹豫了。2月25日萧三给我写了一封很详细的信，内容是：“昨天给你打电话后我非常难过，夜里不能成眠。我看你还下不了决心加入苏联国籍。可能你对我的爱情不是你想的和信里写的那么深。我自己绝对不要迫使或者要求或者说服你